

日本研究丛书

东亚共同体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郭定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日本研究丛书

东亚共同体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郭定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郭定平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

(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6069-0

I. 东… II. 郭… III. 经济合作—研究—东亚 IV.
F11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687 号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郭定平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 峰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069-0 / F·1378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简介

郭定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1998年），东京大学博士（2002年），出版《多元政治》（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上海治理与民主》（重庆出版社，2005年）四部个人学术专著，主编与合作撰写《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比较与创新——国际大都市政府管理体制研究》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地区主义到新地区主义的演变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大事件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演变，从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领土争端问题和东亚文化认同问题等方面探讨东亚区域合作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此外本书还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日本和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著作。

丛 书 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 and 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外,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外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和国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首本付梓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郑勵志

1991年11月

前言

随着战后东亚经济政治的快速发展,东亚成为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地区。首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开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其次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顺利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奇迹”,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全球性的“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和推动下,东亚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在10余年中已经在经济、金融、环境、能源、气象、安全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建设东亚共同体不仅成为东亚许多国家的广泛共识,而且正在转化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实际行动。

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和建设东亚共同体是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需要东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加强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值得庆幸的是,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启动之后,对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就备受关注。著名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和“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 Tank, NEAT)

^① 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22—23页。

就吸收了东亚各国的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参与。在东亚各地每年都举办大量的关于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互相切磋,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曾经于2005年10月举办了“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成果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①。每年东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东亚研究专家发表大量研究论文,出版不少学术专著,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添砖加瓦^②。

尽管关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重视,国外已经有一些研究专著出版,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内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研究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2006年成立了专门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课题组由郭定平负责,杨国庆、王彦智、王菲易、徐恺、黄一玲、王彤、周诗宇、程政洲等参加,胡婷和张帆参加了前期的部分讨论。该课题组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下于2006年3月赴日本进行了专题调研,采访了日本的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猪口孝教授等专家学者,与京都大学的师生举行了座谈与讨论。通过专题调研,不仅收集了更多资料,而且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特别是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立场和态度。在广泛调研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分析研究框架,并进行了课题组的大致分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就研究进度和碰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我们课题组的成员通过研究和交流,不仅加深了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而且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共同体。

① 戴晓芙、郭定平主编:《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近期成果包括:王正毅等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朱立群、王帆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详见附录“参考文献”部分。

本书就是我们课题组集体研究的成果。在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方面,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和探讨,主要包括从地区主义到新地区主义的演变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大事件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演变;其次是总结在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即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领土争端问题和东亚文化认同问题;第三是探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大国影响问题,主要分析中国、日本和美国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最后是总结和展望部分。具体的执笔分工如下:前言(郭定平);第一章“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王彦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章“东亚区域合作的历程”(王菲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三章“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程政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第四章“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王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第五章“东亚领土争端与共同体建设”(周诗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第六章“东亚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徐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七章“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设”(程政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第八章“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建设”(黄一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九章“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杨国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士后);第十章“大步迈向东亚共同体”(徐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附录一“东亚区域合作大事记”(王菲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附录二“参考文献”(杨国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

士后)。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各章作者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现有相关研究成果。除了部分著作和论文在注释中已经说明外,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反映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先期成果和众多先辈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将变得更加困难。

此项研究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因此课题组成员得以访问日本进行资料收集和调查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教授一直给予大量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资助,也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和邬红伟副编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此项研究涉及内容广泛,问题复杂,尽管我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精诚团结、精益求精,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与谬陋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郭定平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	/1
第二章 东亚区域合作的历程	/34
第三章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	/83
第四章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109
第五章 东亚领土争端与共同体建设	/144
第六章 东亚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180
第七章 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213
第八章 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242
第九章 美国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	277
第十章 大步迈向东亚共同体	/315
附录一 东亚区域合作大事记	/330
附录二 参考文献	/341

第一章

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

地区主义可谓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发展之过程、原因、动力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政治、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功能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使其成员国获得了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增长的长期动态效益,有效地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实现,而且这一重要国际现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影响到国家间竞争的态势、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放缓,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整个发达国家经济未能尽快走出“滞胀”的困扰等原因,地区化进程上的地区主义的研究走入了低潮,直至 1986 年 5 月《欧洲单一法案》的通过,欧洲的地区化才得以再现生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地区主义实践大多是不成功的,因此,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以欧洲的地区主义实践为依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普遍缓和与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化问题,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的地区化问题日渐提上议事日程,表现出明显有别于欧洲的一体化的特点,学者们称之为“新地区主义”。

东亚地区面临难得的一体化契机,在各国通力合作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探讨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发展及其影

响,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地区”与“地区主义”的概念界定

在地区主义研究中涉及的概念很多,最基本的两个概念是“地区”和“地区主义”。因此,对这两个概念给予清晰的界定尽管非常困难,但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区”概念

在社会科学中,“地区”的概念来自地理学,主要是根据自然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即指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在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某些同质性特点的地理区域,如中国的东北地区、中原地区,日本的关东地区、关西地区等。在政治学中,“地区”的概念往往与某一行政区划相联系,如北京地区等。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区”概念常有不清楚的地方,但并未成为人们研究中的重大障碍。比较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区”概念就更为复杂,歧义杂陈。

路易斯·J·坎托里(Louis J. Cantori)和史蒂文·L·施皮格尔(Steven L. Spiegel)提出:“我们应把区域视为世界的各个地区,它包含地理上相连接的国家,形成在外交事务上相互联系的单位。”^①也就是说,地理相邻的国家间,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异的认知并逐步形成地区认同,而对外则集体做出反应。在《地区国际政治的综合研究》一书中,这两位作者更是明确地将“地区”界定为:包含两个或更多的互动的国家,这些国家享有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联系,

①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 in Richard A. Falk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Reg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3, p. 335.

它们的认同感有时随着对体系外部国家的共同行动和态度而增强^①。

布鲁斯·M·拉西特(Bruce M. Russett)在《国际地区与国际体系：一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一书中，依据定量分析和系统论方法，主要从人文社会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加强等方面界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区”。他指出，同质性高的地区有时被错误地看作是一体化的地区，地区有时候是通过相互依赖来界定，尽管这种相互依赖可能是在涉及与地区外国家关系时才存在。在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后，拉西特提出了识别区域的标准：(1) 社会与文化的相似性；(2) 国家的政治态度或对外政策的相似性；(3) 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性；(4)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5) 地理上的相邻性。他还指出这些标准不是恒定不变的常量，而是变动不居的变量，因为不同变量的组合，可以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结果^②。拉西特对地区的界定之价值不在于为那些问题找到准确答案，而在于他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地区类型划分法，并千方百计从实践中寻找经验数据加以验证，从而创下了一项对“地区”进行社会科学定量分析的重大成就。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方法遭到奥伦·R·扬(Oran R. Young)的批评。扬认为，拉西特过分依赖要素分析方法，而缺少一个演绎性理论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经验性调查研究不可能为预测性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③。

威廉·R·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论，将地区看作是国际子系统。他提出了地区体系的

①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Eaglewood Cliff, N. J. Prentice-Hill, 1970, pp. 6~7.

②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bd & McNally & Company, 1967, p. 11.

③ Oran R. Young, "Professor Russett, Industrious Tailor to a Naked Emperor", *World Politics*, 21, April 1969, pp. 486~511.

21 种属性,由此得出地区或地区体系存在的四个条件:(1)行为者联系的模式或者说是互动的模式展示了某种规律性并达到了一定的强度,即子系统中某一点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点的变化;(2)行为体一般是相邻的;(3)内部与外部观察者都认为这一子系统为独特的区域或“行动的场所”;(4)该子系统至少包括两个或更多的行为者^①。

可见,国际关系学者对“地区”的界定越来越多地强调区域内行为体(主要是民族国家)间的互动与相互依存,而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地理相邻原则,将地区视为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次系统或是全球整体中的一个中间层次。

其次,将地区视为一个功能单位的观念日益突出,即经济、社会等事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整体。

最后,认同在地区形成与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即地区是一个具有共同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区域。“认同”(identity)是一个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概念,它是一个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是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②。也就是说,认同是“对某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认知,包括在其自身统一性中的所有内部变化及其多样性。该事物被视为保有相同或具有相同性”^③。在国际政治领域,将认同问题引入地区问题研究的是行为主义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④。不过,对认同政治进行系统阐释并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的则是建构主义兴起之后的事。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

① William R. Thompson, *The Regional Sub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7, No. 1, March 1973, pp. 89-117.

② 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载《欧洲》,2001年第2期。

③ James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ume 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8, p. 504.

④ [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33、338—339页。

“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①。亚历山大·温特讨论了四种认同,即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集体。前两种形式的认同具有“自生”(auto-generic)特征,后两种形式的认同有赖于体系文化的特性,而且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角色和集体认同是在冲突型或合作型文化氛围中,通过行为体间的互动而形成的^②。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是在行为体的互动中,通过社会化过程而逐渐实现的^③。可以认为,地区认同主要是指地区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在观念上对所在地区的认同和将其他成员国作为对自身理解的一部分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认知。

因此,可以说,地区的概念是动态的。有鉴于此,肖欢容认为,“国际关系地区主义中的地区,是以一定的地理界限为基础,根据某个或多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因素建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这些社会政治关系因素包括内聚力(同质的程度)、交往(互动的程度)、权力的层次(权力的分配)或各种关系的结构(如合作的程度和紧张的烈度)等。”^④耿协峰认为,“所谓地区就是指人类根据自然地理分布、历史习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范围而划分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⑤。

本文认为,地理因素在界定地区时的作用在下降,这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地理因素的超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它仍然是界定地区中的必备要素;地区化趋势及其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地区共同体的建立,是某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不断强化、地区内行为体的认同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集体身份的过程。因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285—287页。

③ Raagmaa, Garri, *Regional Identity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Jan 2002, Vol. 10, Issue 1, pp. 55 - 76.

④ 肖欢容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⑤ 耿协峰著:《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此,对地区的界定必须突出地区作为一个功能性单位的特质。也就是说,地区日益显示出其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空间的特征。藉此,笔者认为,两位中国学者对地区的界定既突出了地区的功能性特征,强调了地区概念的综合性 and 动态性,也没有忽略它的地理属性,因而可以认为是对地区概念的恰当界定。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对“地区”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概念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不仅是出于行文的需要,也是由于“东亚”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即指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的大陆和边缘地带。就此意义上的东亚是没有争议的。但随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特性,使得“东亚”概念具有经济、文化内涵,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有趣的是,“东亚”概念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他们以欧洲为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远东大体上就是现在所指的“东北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四小龙”的崛起,人们又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包括进来,后来又把整个东南亚也囊括其中,甚至包括整个南亚部分地区。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建立后,“东亚”又出现了“泛太平洋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把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沿太平洋岸的澳洲、南太平洋和北美一些国家也包括在内^①。

如前所述,随着地区内各国(或地区经济体)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地区的界定日益突出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而显示出来的功能性特征,愈益重视地区认同与归属感。在综合学者们对“地区”及“东亚”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南亚、澳洲及南太平洋国家、北美一些国家,一是地理上不相邻,二是经

^① 对“东亚”这一概念的源起、发展以及争议的全面分析,参见杨贵言:《东亚概念辨析》,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